



七天累计确诊六百八十九例 三亚跑出疫『加速度』

□ 本报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文/图

8月7日15时，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指挥部召开第41场新闻发布会称，8月1日0时至8月7日12时，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827例，其中三亚市689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313例，其中三亚市282例。

作为我国唯一的热带滨海旅游度假城市，三亚正处于暑期旅游旺季。如今，旺季刚过半，三亚却遭遇疫情反复，新增感染者数持续增加，疫情聚集性明显并呈快速上升态势，已出现省内扩散和外溢。

自8月6日6时起，三亚市实行临时性全域静态管理。当天，高风险区域调整为168个，中低风险区域调整为67个。三亚市常住人口超百万，另有滞留游客8万多人，昔日繁华热闹的旅游城市被按下“暂停键”。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三亚市各区各部门立即启动疫情防控应急机制，科学精准开展各项疫情防控工作，广大党员干部、医护人员、公安民警、社区工作者、志愿者连续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为广大市民游客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海南省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已成立由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沈丹阳任组长，由省委宣传部、省卫健委、省财政厅、省文旅厅等部门共同负责的游客服务工作专班，专班各项工作已于8月5日展开，将全力做好三亚、儋州、陵水等涉疫市县滞留旅客的安置安抚、服务保障应急等工作。

旅游城市突发疫情 景区纷纷暂停营业

8月1日，三亚市在崖州动车站例行落地检时，发现1名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异常，经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三亚市启动应急预案，对相关人员进行隔离管控、协同排查。

8月2日0时至24时，12+1；8月3日0时至24时，10+1。到了8月5日0至17时，189+11；8月5日17至24时，40+17；8月6日0至24时，240+173……短短7天时间内，三亚市阳性感染者累计突破900关口（689例确诊病例+282例无症状感染者）。

据通报，经流行病学调查和病毒基因测序分析，发现引起三亚“8·01”疫情的是新冠病毒奥密戎变异株BA.5.1.3，BA.5.1.3是我国首次检出，也是目前全球最受关注、传播力最强的毒株。

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本轮疫情多为境外输入引起，崖州中心渔港是此次疫情的始发输入地。从目前病例来看，感染者多与渔港、渔船、渔民和渔市相关，传播链以崖州中心渔港为中心呈放射状，疫情处于上升阶段，存在发生城区社区传播的风险。

连日来，三亚市新增的感染者数持续增加，海口市、儋州市、琼海市等市县先后报告感染者，疫情波及范围进一步扩大，逐渐出现省内扩散和外溢，防控形势严峻。

为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三亚市多个景区纷纷宣布暂停营业。据专家组研判，自2022年8月6日起，高风险区域调整为168个，中低风险区域调整为67个。本轮疫情防控形势更加严峻复杂，已超过今年的“0331”疫情。据分析，目前感染者主要是当地居民，主要分布在三亚湾和亚龙湾，刚好是游客最集中的地方。三亚市强化对两地的管控，保证游客免受或者减少病毒感染的风险。

闻令而动多措并举 安顿八万滞留游客

《法治日报》记者采访了解到，作为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三亚吸引了大批暑期游客。由于疫情突然来袭，众多游客来不及回程，在实行临时性全域静态管理后，很多游客已退房，航班也被取消，只能在机场等待，目前大概有8万多名游客被滞留在三亚。三亚是知名旅游城市，目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广大游客带来诸多不便，希望广大游客对我们采取的防疫措施给予理解与支持，我们会全力为每一名游客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8月6日，三亚市政府秘书长李端荣在三亚市第21场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如是说。

如何做好好旅游服务工作，李端荣介绍，全市各涉旅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将竭尽全力为市民游客提供优质贴心的服务。目前已成立订单退订工作专班，妥善做好因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订单退订工作，简化退订流程，提高退款效率，切实维护广大游客的合法权益。

目前，在三亚滞留的约25万人属于滞留在酒店的游客。针对滞留在酒店的游客，自8月6日6时实行临时性全域静态管理时，酒店可以为滞留游客提供半价优惠的续住服务，按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游客在完成7天风险排查后，即7天内第1、2、3、5、7天核酸检测阴性，经评估后可离岛。

8月7日，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厅长刘成祥，对已接待滞留游客入住的酒店，8月6日起7天内统一按原入住价格的五折续住，续住费用由入住游客承担。如游客选择不再续住原入住酒店，由其从所在区域酒店（公布不同类型酒店）名单内自行选择，8月6日起7天内入住同房型价格按原定价格的五折确定，更换酒店游客的转运工作由交通部门负责调拨车辆保障。对酒店反映的五折价格不足以支撑成本等问题，由市、区两级旅文部门协调酒店给予适当补贴。

刘成祥说，8月6日，已将滞留三亚凤凰机场的3273名旅客，分别安顿在三亚湾丽禾温德姆酒店、阳光豪生度假酒店、银泰度假酒店、大东海酒店、大东海柏瑞精品酒店等11家酒店，并提供7天的酒店食宿服务。

全民动员全员抗疫 为“追阳”锁定传染源

疫情发生后，三亚市各区各部门立即响应，广大党员干部、医护人员、公安民警、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冲在疫情防控第一线，为广大市民游客的安康保驾护航。

由于辖区度假酒店、游客以及途经货运车辆较多，连日来，在三亚市竹湾疫情封控卡点执勤的蔡克超，一站就是8个小时，不论是烈日下还是暴雨中，逢车必查、逢人必检，筑牢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蔡克超是三亚市公安局海棠分局林旺派出所民警，与其共赴战“疫”一线的，还有他的妻子丁晶。作为三亚市中医医院感染科护士，丁晶驻守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核酸检测采样点。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这样的“警医”夫妻档，战“疫”父子兵齐上阵的情况不胜枚举。8月5日，国家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派出工作组指导海南疫情防控工作，8月6日，海南省委书记、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沈晓明要求落实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坚持以快制快，强化疫情应对组织体系。

8月7日，海南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综合组副组长、医疗救治组副组长、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文秀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为了加快混管阳性筛查速度，三亚成立“追阳”别动队，进一步优化“追阳”工作流程，增加采样人员，持续推进“追阳”工作高效开展，以核酸检测和流调的“加速度”“超速度”跑赢病毒传播的“快速度”，快速排查锁定传染源，为疫情防控争取更多的时间。

接下来，海南将强化疫情应对组织体系，切实按照职责分工，直插一线、靠前指挥，做到统筹兼顾，严格管控人员外流，确保不外溢一人。全面落实疫情发生地的人员管控，按照风险等级，从严从紧加强社区管控，强化“三公（工）”协作，优化协调机制，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支撑。

同时，海南省要求各市县委完善核酸筛查方案，尤其采样、送检、报要高效衔接，弥补能力不足短板，加快提升核酸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能力，快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把“追阳”当作优先级最高、抓得最实、切实缩短“追阳”时间，务必完成“追阳”清零，尽快把隐匿风险捞干净。全力做好集中隔离和医疗救治工作，统筹全省隔离点和方舱医院，分级分类安置就寝。齐心协力扛起防外溢政治责任，强化外溢人员风险排查，堵住境外输入风险源头，把好入境“关口”，做到返港渔民“七天五检”，做好医院防护工作，严防医护人员感染，确保群众正常看病就医需求不受影响。

据了解，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海南工作组的支持下，7个省市选派175名流调和卫生监督人员，同时广东、上海、四川、江苏、河南、河北、江西、湖南等15省市199万份/日核酸检测能力驰援海南，迅速建立国家、省、市（县）联合工作机制，统筹防输入、防反弹与外溢，海南全省调度支援三亚，成立省市联动工作组和“1+2”小分队，提高疫情处置工作效率。鉴于省内人员流动频繁，针对前年来三亚已离岛的旅客，通过赋码、发短信、区域协查等方式，督促人员管控，切实履行防外溢的责任。



▲ 三亚本轮疫情发生后，三亚市公安局民警赶赴辖区交通要道，对过往车辆进行健康码检查。

调查动机

近日，22岁女生徐某某在浙江省杭州市从事直播运营工作因连续加班突发疾病去世，相关新闻冲上热搜，引发公众对于新业态劳动者权益的普遍关注。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迅速发展，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新业态劳动者越来越多，比如主播、代驾员、网约车司机、送餐员等。他们目前的生存状态和工作环境如何，权益是否得到保障？围绕这些问题，《法治日报》记者进行了深度调查。

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高加班熬夜是常态 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怎样兜牢

□ 本报记者 陈磊 □ 本报实习生 周于卜

17时开始直播，24时下班；次日6时至9时，加一次直播；当日12时开始接着拍摄短视频，直播，直到21时下班，结束将近一天一夜的直播工作后，今年22岁、刚参加工作半年的李婷婷（化名）发出感慨：“活着真好。”

李婷婷毕业于浙江省一所高校的播音主持专业。今年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进入直播行业，工作内容包括拍视频、选品、上播、复盘等，熬夜加班是常态，“比较赚钱，养活自己没问题，但公司根据直播时间计算薪酬，不干活就没有收入。”

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迅速发展，像李婷婷这样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人越来越多。比如主播、代驾员、网约车司机、送餐员等，他们被称为“新业态劳动者”。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走访多名新业态劳动者发现，受访者每日工作时间大多超过10小时。根据公开信息，新业态劳动者“工作致死”事件时有发生。

多名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随着《关于维护新业态从业者权益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发布，具有劳动关系和不完全劳动关系的新业态劳动者纳入法律保护范畴，在社会政策上已经得以明确，未来亟须在此政策框架下建立符合数字经济时代的工时制度。

受访专家建议，根据是否具有劳动关系进行分类治理是基本方向，重点在于建立针对不完全劳动关系的新业态劳动者工时制度。比如为新业态劳动者引入工时账户制度，以解决劳动者随时线上线下、为多平台工作的量化计算问题。同时，加快制定劳动基准法，建立强制性的工作时长限制制度，更重要的是，尽快建立新业态劳动者劳动报酬合理增长机制，逐步提高劳动报酬水平。

加班熬夜比较普遍 遇到大促全天直播

李婷婷的日常工作是直播卖女装。每天的直播时间，少则4小时，多则10小时。直播之前需要拍摄相关商品的短视频。开播之前拍摄需要三四个小时，直播时播放短视频以吸引流量。她一般在下午开始直播，播完后复盘直播，同时选第二天要卖的商品，回到家已经是次日两三点。

7月中旬，李婷婷经历了一次将近一天一夜的直播。那天，公司安排她直播7个小时，夜里12点下播，到家已是凌晨两点。刚到家，公司负责排班的同事给她发消息，通知她早上6点到9点参加一次直播。考虑到时间太紧，她打算拒绝，可对方说实在安排不开，她只好答应。

为了节约时间，她不卸妆、不睡觉，带货等到清晨5点多赶往公司直播。上午的直播结束，休息一小時后，她于当日12点开始拍视频，持续到下午，接着是10小时的直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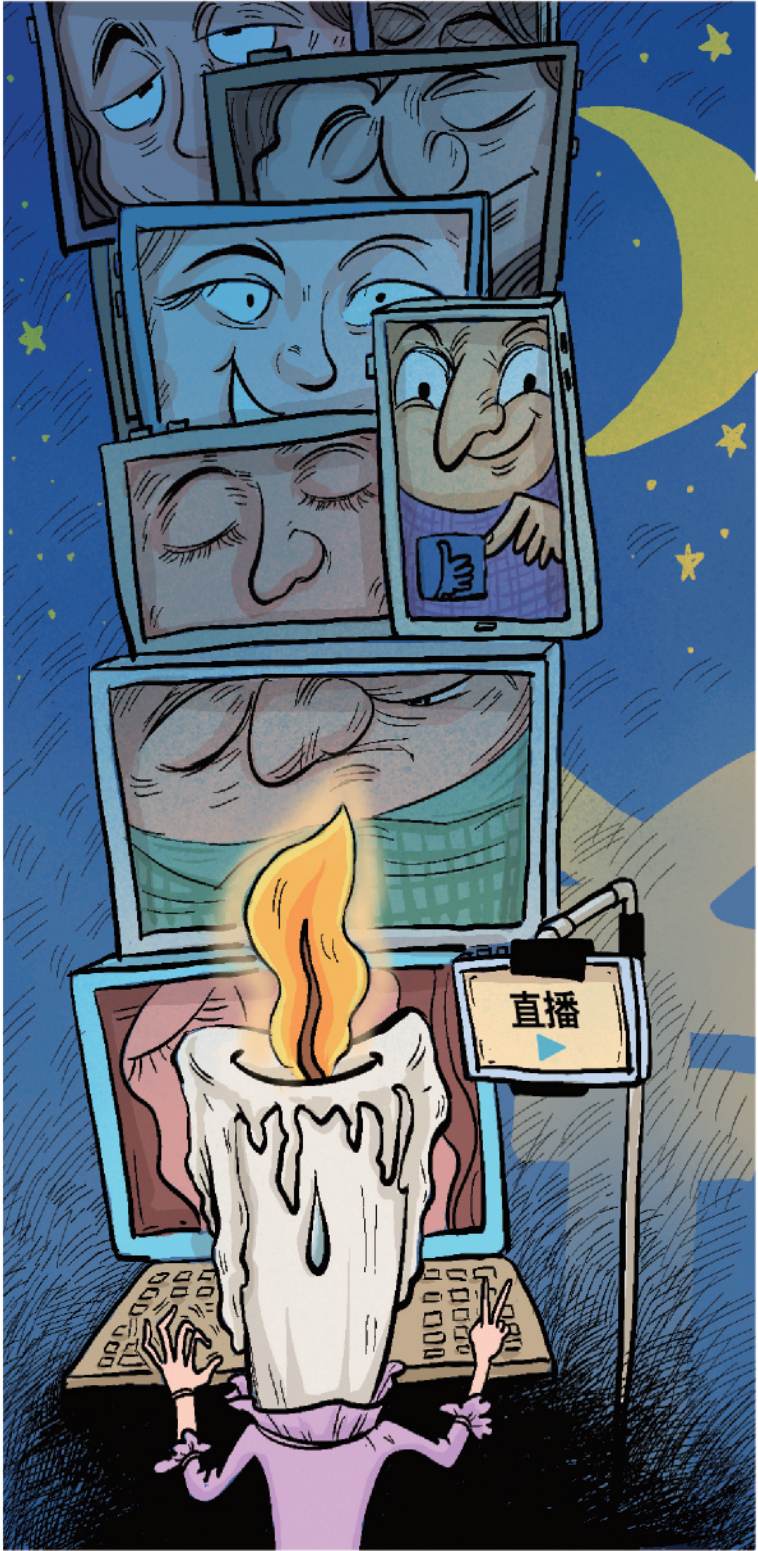
“我的脚腕受过伤，心脏也不太好，长时间站立直播挑战了我的身体极限，到晚上9点多已经意识迷糊，身体不听使唤，全靠搭班同事完成直播。”当天直播结束后，李婷婷等不及复盘就回家了。

前不久，同为22岁的女生徐某某在浙江省杭州市从事直播运营工作因连续加班突发疾病去世事件发生后，李婷婷收到了很多朋友发来的信息，让她注意休息。但她明白，从事直播工作，肯定需要熬夜加班，因为消费者能够闲下来看直播的时间，大多是在晚上；此外，她所在公司计算主播的报酬标准之一是直播时间。

李婷婷的经历并非个例。有直播从业者称：“介绍完最后一款商品，关掉直播后，时间已经过了零点，我累瘫在了椅子上。”

记者采访的多位直播从业者说，她们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连续加班熬夜比较普遍，在大型购物节期间（如“6·18”“双11”）会进行“日不落”直播，即24小时不间断直播。

这样的工作状态让她们经常感觉吃不消，有的从业者甚至因此萌生去意，准备退出直播行业。



《“透支式”加班不可取》漫画/高岳

执行力度有待增强 新业态工时缺规范

除了直播行业从业者，其他新业态从业人员的职业同样处于工作强度高、劳动强度高的状态。

今年39岁的郑乐（化名）在北京开网约车，已经有多年从业经历。他最初选择网约车的想法很简单，“时间自由，赚得多”。然而，当他真正进入这个行业后发现自己错了，“基本上每天早上8点半上车，晚上12点左右才能回家休息，只要一睁开眼睛就在工作”。

作为一名网约车司机，郑乐最多的一天接到50单，按照平台规定，每一单平台抽成20%。他平均每个月挣两万元左右，扣除出租车等费用后到手1万多元。

郑乐与其他网约车司机交流后发现，大家的日程都很相似：每天早上8点准备接单，之后保持接单跑车的节奏，直到晚上七八点下班晚高峰接单。之后，少数司机选择结束一天的工作，但多数司机继续工作两三个小时。“没办法，要想挣到钱，就只能花更多时间跑更多的单。”郑乐说。

陈兰开（化名）今年40多岁，自2017年开始在北京专职从事代驾服务。

他一般下午5点左右接单，接单高峰期是晚上10点到12点，之后陆续接单一直持续到次日早上四五点钟回家休息。“我的工作只能跟着客人的需要走，客人晚上喝完酒叫代驾，我把客人安全送回家，要想多挣钱，就要多接单。”

李婷婷、郑乐、陈兰开等人的背后，是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千万名新业态劳动者。对他们来说，每日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加班熬夜已经成为常态。

“随着平台经济迅速发展，新业态劳动者数量大幅增长，这个群体普遍

存在工作时长、工作强度高等问题 劳动者长期处于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模式中，一定会导致身体负荷过重，给身心健康带来巨大的挑战和影响。”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保全说。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看来，新业态劳动者多通过平台等进行工作，在线时间比较灵活，其工作时间计算很难通过既有的按时上下班的工作时间计算规则来完成，需要进行专门的制度设计。另外，工时计算还涉及工资标准问题，这会增加制度设计的难度。

对于不少新业态劳动者超限时工作现象，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室副主任王玉认为，需要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构成劳动关系，则适用于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对工时制度已经作出明确规定；但在实践中，劳动用工执行力度不够，对于这种违反劳动法律的行为，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手段。

“对于没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如网约车司机、代驾司机等，其能够自主决定是否工作、何时工作以及何地工作；其通过平台获得收入，与平台之间形成经济从属性，并且因‘平台积分’而必须受制于平台规则。针对他们的工时制度等，我国尚未建立起与新业态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王玉说。

建立工时账户制度 提高计量任务单价

2021年7月，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企业应当依法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指导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随着《指导意见》的发布，具有劳动关系和不完全劳动关系的新业态劳动者纳入法律保护范畴，在社会政策上已经得以明确。但在《指导意见》框架下，同样需要以新业态劳动者是否与相关企业建立劳动关系为标准，进行分类施策。

在沈建峰看来，未来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哪些劳动法规可以适用于不完全劳动者，已有的劳动法律制度如何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用工模式等。

王玉的观点是，要完善劳动法规，确立工作时间总时数的底线，同时建立适应互联网时代工作灵活性的工作时间的调配制度。

“劳动法可以考虑设定每月或每季度的加班上限，取代现有的每周加班上限规定，并在列举特殊情况的前提下适当提高加班上限，以便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工作灵活化的趋势。”王玉说，与之相配套，应当大幅度提高违反工作时间标准的法律责任，让劳动法律具有强制执行力。

针对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情形，受访专家建议尽快补齐法律法规和规范的短板。

“在规范层面上，法律法规应当进一步对不合理的工作时间以及不合理的用工模式进行规范，尤其是出台一些规范灵活就业群体用工模式的规定。”杨保全说。

沈建峰提出，就工时而言，作为计算工作量、平衡劳动者工作与生活的重要制度，应当适用于平台劳动者。此处的难点在于，平台劳动者的工作时间通过线上线下线来确定，经常处于不确定状态，而且上线和实际工作有时并不同步，同时还可能存在为多家平台同时或者接续工作的情况，这些都意味着不能通过传统工时计算方式来计算平台用工的工时制度设计。

“未来可以考虑为平台劳动者引入工时账户制度，以解决随时上线下线、为多平台工作等带来的过度劳动问题。当然，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劳动者观念的改变是该制度实施更基础性的条件。”沈建峰称。

在王玉看来，应探索基于经济从属性的任务量型劳动基准，控制承揽任务单价、连续性和总量，建立算法知情与集体同意规则，在劳动基准立法中采取“独立成章”的制度建构路径。

“可以建立任务量型劳动基准制度，在从业者灵活就业总时长无法直接控制的前提下，大型平台可以通过任务连续性和总量的控制来限制劳动者工作时间，防止过度劳动。通过一定程序确定劳动者的任务单价并经公示后，便于从业者计算实现收入预期目标的每日工作时长，进而在整体上实现行业工作时间均值维持在一个合理区间。与此同时，必须把劳动者的任务单价向上去调整，在劳动者任务单价提高、总体报酬同步提高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则会缩短。”王玉说。

外部的监管也必不可少，杨保全认为，从业者的权益有赖于从各方面进行保障。在执法上，政府有关部门应当肩负起监督管理职责，针对不同行业制定不同级别和强度的监管机制，加强预警机制，制定常态化、不定期的检查机制，及时查处侵害新业态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平台企业，对严重违法案件予以公布。

杨保全建议，有关部门应积极行动起来，从各方面保障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大劳动保障监察力度，督促企业落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责任，加强治理拖欠劳动报酬、违法超时加班等突出问题，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

“各部门和单位要认真履行职责，强化工作协同，保障劳动者权益纳入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体系。建立平台企业用工情况报告制度，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联合激励惩戒机制，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和司法解释。”杨保全对记者说。